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 哈佛快活吗？

(节选)

报告文学

# 哈佛快活吗？（节选）

陈祖芬

# 哈佛快活吗？（节选）

陈祖芬\*

## 泰坦尼克号是怎样建成的

教授对周勤说，你学我这门课，你就一天只能睡两小时。周勤想，那么，我学四门课，我就没有睡眠时间了，我就得倒贴睡眠时间了。

周勤瓜子脸高鼻子大眼睛，穿暗绿的羽绒服和黑底带红绿色块的毛衣，两条细腿轻捷地走来，好像一只羽毛美丽多彩的小鸟。小鸟第一天来哈佛，有人带她参观图书馆，哈佛一百家图书馆中最大的威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12根希腊式圆柱撑起威德纳。走进书库，一眼望不到头，密压压的书架，向这个新生压迫过来，叫人产生在豪华轮三等舱

---

\* 陈祖芬，1943年生，女，上海人，报告文学作家。著有《祖国高于一切》、《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等20余部作品。本文分别原载于《北京晚报》2001年7月16日、《人民文学》2001年第6期、《中华英才》2001年第11期、《新华日报》2001年10月14日等。

的自卑感。书库一层一层往下有 6 层，越走越有恐惧感——还能走得出来吗？越走越有无助感——置身于知识的海洋里，你就是写出几本书来还不是一下被吞进书的巨浪？

后来她才知道，威德纳是哈佛学生，1907 年在哈佛毕业后，与父母同乘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被冰山撞沉，威德纳的母亲就是那位著名的幸存的老妇人。后来，电影《泰坦尼克号》出来了，世人知道有一位幸存的老妇人。不过世人并不知道老妇人的儿子也活了下来，活在这所他母亲捐助的图书馆里，鼓励一届又一届的哈佛学子用知识的力量去撞击愚昧的冰山。

母语不是英语的人，在英语国家读博士，与生俱来地处于语言的劣势。周勤看她的同学上课时用电脑做笔记，飞快。下课后想跟他借一下笔记。那同学很吃惊：NO，我们是竞争对手，要是把笔记借给你，这不公平。周勤也很吃惊他的思维方式和他的坦率。是的，他很坦率，是的，他的讲话很现代很美国也很公平。周勤近乎心悦诚服地对同学说：谢谢你，我向你学了一课！

周勤想起她的导师对她说的：这个地方只问收获不问耕耘。

周勤在哈佛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跨三个领域。在哈佛 5 个图书馆有她签下的归她用的书桌。哈佛图书馆的每张书桌下都有两个插头，都可以插上电脑。周勤的电脑就放在图书馆的书桌里。她的一个中国来的好友写了本书，叫《海外学子》。定稿时把书名改成了：《谈何容易》。

不过，我知道周勤什么都能闯过来，从她弹性的脚步，从

她明亮的眼睛，从她动人的笑容。她说她现在会笑了——她是说，听得懂美国人讲的笑话了。听笑话，不光要懂语言，更要懂其文化背景，才笑得起来。譬如我们在国内，说一句：让列宁同志先走，大家笑。因为大家在七十年代都来回看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

周勤很受感动的，是不少美国学生考哈佛的东亚系。凡是考东亚系，都要考两门东亚语言。就这样的好学生，本来完全可以考哈佛的法学院、商学院，毕业后好找工作更有好的薪水。可东亚系毕业就有可能不好找工作。但是，一个人，当他（她）热爱他的工作（学习），如同全情爱上个人，那是不计一切的。周勤说她的人类学导师张光直，得帕金森氏综合症后，不能走路按说不该来办公室，可他老来，尽管老是摔倒。哈佛德高望重的教授史华兹，82岁高龄，两年前动了9个小时的癌症手术，现在又照样天天来办公室。

这就是哈佛。

周勤刚写完的一本书《十年机缘》就要出版了，她又把一个论文题目报给史华兹。史华兹一听题目眼睛就亮了：“你有野心，这是个终生课题。”当然，这个题目很具挑战性，可驱动的资源很少。她讲主体对宇宙秩序的认同，与上天意志的相合。我听不懂。她讲埃及为什么不建长城，中国为什么不修金字塔，美国人为什么不四世同堂。我只是想，她的泰坦尼克号，她的知识的豪华巨轮正在建起，而且一定会撞倒面前的重重冰山。

哈佛人都知道哈佛有一百座图书馆和一百座博物馆。而我知道，哈佛还有一个世间无二的船队——一个个哈佛学子，

是一艘艘知识的豪华巨轮。

## 在哈佛看病

### 找不到医院的感觉

2月3日，我不能不面对最痛苦的时刻——上医院。梦溪在京的干部医疗证，一次也没用过。我们有病乱买药，就是不愿去医院。在这里，哈佛为我们买了医疗保险，哈佛的医院也不远。可梦溪只要还撑得过去，是决不愿去看病的。

但是今天，我们只好走向医院了，好像走向世界末日。昨天在街上走，皮靴一脚一脚踩在厚厚的积雪上，感受那种把脚埋进雪地的惬意。昨夜一场雨，把积雪冲洗个干净。今天的气温突然升到华氏55度（华氏32度相当于摄氏零度）。草地绿茸茸的，新英格兰的红砖墙红砖地，在阳光下焕发着。前边一个纤弱的女生，就穿着牛仔裤和白色短袖T恤，一根金黄的“马尾”在头上一颠一颠的，好像一只报春鸟。她好像能感应我对她的赞赏，两只手伸到后脑勺上松开马尾，一头金色的长发随风飘洒开来，立刻被阳光缀满了闪烁的金星。我想起马克·吐温说的：新英格兰的天气，好像女人的面孔，变化无常。

走进医院，更觉得春光明媚——候诊的学生们全在读书。一个金发女孩，双背书包立在脚下红裙旁，黑上衣的袖子高高地挽起，右手按着一本书，左手往搁在腿上的本子上写笔

记。一个金发男孩，在双腿上摊开一本大厚书，嘴里咬着一支黄色划道笔，一动不动地看书，像一座图书馆前的雕像。又一个稚气的金发男孩，右手托着左肘，左手举着本书，双脚稚气地内八字地对着。整个人就像他的白色 T 恤般纯净。

这里，与其说是医院，还不如说是哈佛的又一座图书馆。连上了年龄的人也都在看书。以前在医院候诊室，常常看到病人的愁苦。在这里，找不到愁苦，只看到自信，一种对自我的期望值的追求和自信。

找不到医院的感觉。

护士把我们带进一间屋子等医生，可亲地，可掬地。她轻轻拉上门走了出去。一会儿有人轻轻敲门，那么轻柔，好像不好意思惊扰我们。我赶紧说请进，倒好像我是这屋的主人。“客人”笑盈盈地进来了，哦，是医生！明明知道是病人在等她，却好像是她到朋友家来做客。她欢快地和我们打招呼，拉着梦溪说见到你很高兴。又说她丈夫刚从中国回来，老友重逢似的。

哦，找不到医院的感觉。

她出去和另一大夫商量用药的事。一会儿回来了，又是轻轻叩门。这样地尊重病人！临走给我们一张名片，有事随时可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着祝你快乐祝你好运送我们出来。在哈佛看病，真的好运呢，真是享受呢——享受医生、护士的友爱和欢快，享受病人的自尊和自信。

## 在哈佛医院欠下的人情债

2月20日午夜梦溪又过敏了，而且来势凶猛，不能不去医院急诊。医院大门关着，门旁贴一条，清楚地写明要走边门从地下室入。到边门地下室，一位女警卫告诉我们，坐电梯上到三楼。果然，一到三楼，就温暖如春——一位值班女士只穿短袖和花裙，红润丰满的脸蛋，叫人想起草莓冰淇淋。候诊室的沙发椅旁，都堆着很多杂志。我一眼看到一本《GO》，我喜欢这本青年杂志的刊名，去年我的一本散文集就叫《青年就是GO》。在这里看到《GO》，倒像他乡遇故知似的亲切。

一位值夜班的医生走到柜台后填写病历。他那年轻的脸上，填写了一脸敬业。因为过劳，他的脸色、眼睛和头发，好像一概地苍白了。他走进去，又走出来填写什么，看不到他的表情，只看到和白大褂浑然一体的苍白。

待他又走进去时，那草莓冰淇淋对我们甜甜地奶油地说：对不起让你们等太久了。

哦，不，人坐在这里，就有了一种踏实感、安定感。虽然我想，好像医院药房关了。那么我们怎么取药呢？

“梦溪刘。”终于那位男医生拿着梦溪的病历卡来了。依然苍白着。一个人疲劳成这样，是笑不出来的。我们向他走去，他笑个灿烂，用中文讲：“你们好！”

美国人爱讲 Surprise，这才是 Surprise。我没想到他会讲中文（虽然后来知道他只会讲这一句中文），更没想到他会笑，

笑起来好像灰蒙蒙的天空一下云开日出阳光灿烂。

他详细地问病情。然后开了药，说 Cambridge 最大的药店 CVS 开着，在超市附近，现在就可以去买药。然后又关切地问：你们有车吗？

我说我们是来访问的，没有车。他说那么叫计程车。说完一顿又匆匆出去了。

在北京叫计程车是家常便饭，在这里必须到计程车站才能叫到车。那医生肯定为我们想到了什么。他去干吗呢？

他拿来了几颗药，说：这里有两种药，三粒红的一粒绿的，现在就吃下，那么今晚就不用买药了。明天上午再去买就可以了。哦，真是太好了。在 Cambridge，虽然白天已经相当熟悉，可是午夜出门寻找药店，实在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何况梦溪病着！医生又匆匆返身走出去，为梦溪端来一杯水。他为梦溪剥开一颗颗药，让他就水服下。

送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一连说着欢迎再来一边问我们“欢迎”这个词用中文怎么讲？他已经累得像午夜幽魂，还想学说中文“欢迎”，还想用最后的精力给病人多一份鼓舞和欢欣。

在哈佛医院，前后见了三、四位医生了，都好像接待好朋友老朋友那样接待我们。我觉得很过意不去。他们亲热地把我们当朋友，我们看完病就走了，就好像欠下了一份人情债。在他们天天如是，对谁都如是。不会记下今天做了什么好事，不会宣传今天善待了几个病人。人本来就应该是善的，与人为善的。尤其面对病人，面对被苦难折磨的人。我不想用“医德”这种很沉重的词。我只是觉得那个苍白的椭圆，真

可爱、真美！

走出医院我心里还在对他说：good luck！

我想，一个人，如果有很多人在心里祝福他，一定会在他周围造成一个祥和的气场。这个气场，会形成一个幸运的保护层，让他一路好运。

## 贵人乡里的小女生

昨天晚上参加艺文小集活动，见到了她。一袭暗绿衣裙，裹着玲珑纤巧的身子，一头乌黑蓬松的鬃发，披散在单薄瘦削的肩上。非常瓜子的小脸，非常桂圆的大眼，张凤！

和张凤相识是几年前在北京，中美作家的活动上。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并没有多少交流。这次在哈佛相见，她请我今天中午一起吃饭。

今天一见她，我眼前又一亮——她头戴小红帽，身穿红大衣，整个儿一个红孩儿似的鲜艳美丽。她说中国人喜欢大红大绿，她也觉得红的绿的好。

她的人气果然很旺。中国有句话，叫做有贵人相助。她周围总是贵人云集，她是身在贵人乡。哈佛华裔学者宝塔尖上的人物，一个个都是一等的人品，或者用老师给学生写评语的话，叫做：品学兼优。

张凤讲起这一个个“贵人”，大眼睛一下一下眨巴着，小女生追星族似的不知怎么形容他们才好。只好用笔把他们一个一个写下来，出了一本一本关于哈佛的书。“我们只要回头去看，又有谁记得托尔斯泰那代的帝王？或者与司马迁同时

的富贾？”（《哈佛心影录》）

她写哈佛前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哈佛东亚系主任杜维明，一个人一门学科，写这样的学者，总得先读他们的书吧？

“都得读！”她小女生般地认真，“他们个个著作等身，比我人还高！”

我不由又看一下她纤小如小孩子般的身子。

张凤每写一位学者，先把学者的书全搬到家里。她从小好读书，总想读很多的书，更多的书。在台湾读历史系的时候，自己又去学中文速读，在全台比赛拿下第一名。这位速读第一名最快速地把书全部翻完，然后思考，把书内化成自己的养分，而不是远远的一本别人的书。

我说我从来没写过学者。因为我没有勇气去啃下大堆的学术书。

而她白天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编目组工作，晚上用报导文学写这些学者。这位密西根州立大学历史硕士，找到了同时通晓文史哲的方法。再要有人称赞她的文章，“那是我太高兴的事”！

她小姑娘似的绝不掩饰喜欢听人夸奖。其实，爱听好话是人类共性，不过很多人会表示不喜欢，至少并不在乎好话。快活地说自己喜欢听好话的一定是个快活的好人。她在哈佛像一根美丽的毛衣针，编织着一项项美丽的活动。

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哈佛华裔学者有一次“剑桥新语”。当年赵元任先生在哈佛时，常常请来胡适先生几人在家聚谈。后来，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也家传似的定期请来很多人在家聚谈。赵家总是准备一锅红粥，有红豆、红枣什

么的。有时在哈佛另一位很有古道古风的教授陆贵风家里相聚。陆家准备一锅白粥，有薏仁、白果、莲子什么的。有人戏称这样的聚谈叫红白粥会。到1983年，才有了一个大名，叫：剑桥新语。每次二三十人，甚至五六十人。没有那么多椅子，就席地而坐。每次有人主讲，大家提问讨论。大都是哈佛人，也有附近学院的。张凤说，像杜维明这样宝塔尖上的大忙人也经常来。杜维明笑：光喝那粥就够了。

那种红粥白粥，自是滋补。学人们在一起，求新求进步，也是一种互补，也如一锅补养的粥。

张凤还忙乎另一个活动，叫艺文小集，如一种湿润滋补的粥。在每月第一个周日的晚上。昨晚我去参加这一期的艺文小集，发现很多人讲话讲到张凤。

张凤问我下一批大陆来哈佛的是谁？是不是太专门学科的？太专门学科的不适合演讲。她又在考虑下一次艺文小集的主讲人。

在发达国家，惜时如金。是不能不便也不可以随便麻烦别人侵占别人时间的。如果生病什么的，会想念国内的亲朋，国内会有很多人助你。在美国，谁能劳烦谁呢？偏偏有一个张凤这样不遗余力，她觉得她在传递中华文化之余，也是对心灵的些许交代。

张凤，对，美丽的毛衣针张凤，这么多年在哈佛编织美丽的故事，这也包括她自己写的故事。她不是教授，更不是宝塔尖上的贵人，但是，哈佛乃至波士顿的华裔学者群里，如果没有张凤，就会有一点失落，有一点寂寞，就少了一点美丽的梦幻。

于是就有人以为张凤如何地大。张凤笑：“我最大幸福的想法，就是在家坐着，对着儿女织毛衣。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她今天脱了红大衣，是一身自己编织的毛线衣裙，那是她的手工。

当然，要是规定她只能在家织毛衣，那她绝受不了。张凤，那是一只展翅的凤，她这头挑起传统的妇道，那头挑起新女性的社会职责。“我要有一份工作，可以有点作为——不对，不是作为，那太过分了，是——可以有一点发挥的事情。”她怯怯地笑，缩起本来就小的身子，一直把自己定位在小女生的位置。她说，她前世里一定是很古典的女性。她家有一张特别大的餐桌，可以坐下20来人，有这么大餐桌的家庭，女主人一定会烧一手好菜。80年代中国第一次向海外派留学生，她这张餐桌就温暖过很多海外学子孤寂的心。

总是要把先生、孩子全打发进梦乡了，她才能开始自己的又一份工作——写作。常常是清晨四五点，就在那里写她的哈佛了。《哈佛心影录》、《哈佛，哈佛》，哈佛于她是一本写不尽的书。王德威在《哈佛心影录》序中说：“当代人物访问，多偏重政商两界；所谈所录，亦囿于一时一地的话题。《哈佛心影录》以学者为写作对象，以学术思想为论介重点。诚如哈佛校训‘美丽充实’所谓，知识的追求、真理的辩证，方是文化建设百年大业的基石。”

张凤想把哈佛文理各科的华裔教授和前来哈佛访问的学者，搬到普通大众眼前，让华人世界的人都能接近他们。她说她的书是摆渡船。把他们一个个摆渡到大众跟前。“我总有一点中国小女子的心态。他们能和我这么好，因为我先生和

他们是同事。否则，我怎么能这么接近他们？”

这位小女子，这样地传统又这样地坦诚！

而“他们”，张凤说：“越是充实的人，越是低垂自己。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都是最好的人，为他们卖命都没关系。”

这样的话从这个小女子嘴里说出来，真觉得中国文化的侠骨古道，有怎样坚实的力量。我看见眼前这个小女子正风尘仆仆地从千年历史长河中走来。她浅浅地笑：“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很老了。因为，我小时候，父亲就教我老庄啊，佛学啊，教我苍老的文化。”

但在她不小时候，又很小了。她有时候还穿她 16 岁时的衣服。有人和她开玩笑：你有没有穿 12 岁的衣服？

她的身子，就是一个 16 岁的小姑娘。她的眼神也常常是 16 岁。在这个美丽而充实的贵人乡，在这个充实而低垂自己的贵人乡，如同保存新英格兰红砖白窗的建筑，也保存了红红火火的热情和洁白纯朴的心灵。

前年她应邀访问中国，带着她七十几岁的母亲。友人对她说道，出游时是不是不一定带上你母亲，我们几个走路可以快一些。去年中国作协又来电邀请她，她还是想带上母亲。但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次多了一点聪明。她问，可不可以带长辈？——她不直接说母亲，觉得“长辈”这个词含混一点，朦胧一点，也许不那么年长不那么老呢？对方说可以。她又问：有没有年龄限制？对方说没有。张凤把带妈妈同行的行动合法化了，好不高兴！母女偕同到了北京，一看别的作家有先生带太太的，有太太带先生的，只有她是带老妈的。这

一路上，所有的人都来照顾她妈妈。妈妈荣升太后勤。张凤嘛，被评为二十五孝——大家说，看来二十四孝得加上一孝了——孝女张凤。

张凤的先生黄绍光，是哈佛核磁共振实验室主任。先生常常出国讲学，她就不能当作家，只能当管家。她鼓励三个孩子把多方面的感觉发掘出来——钢琴、提琴、电子琴、黑管、舞蹈、歌唱。张凤自己一定有第七感觉、第八感觉。她感觉丈夫在核磁共振实验室工作，他身上一定带磁，每去找先生，她在实验室门外老远叫绍光，而且把手提包放身后，怕包里的信用卡被先生带磁的身体消了磁。反正我知道先生没有把她消磁，而是哈佛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她吸住了。她要用她的平实的文字，把哈佛的贵人们摆渡到大众百姓中。“今我以轻舟摆渡，载不动的更不知有多少……”她很有一股以史料为己任的劲头。

## 儒学飞人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

### 哈佛，中国文化的课堂最大

他随身带的黑包上贴满了航空标签。他坐飞机多，航空公司给他优惠，买一般机票可以坐头等舱；旁边没人，还可以优惠他一人三个座位。他有时不得不把课程排在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四上完课就直奔机场，星期一可以从机场直奔

教室。他已经没有了时差，下机就演讲，或者演讲完就去机场。一次遇上恶劣天气，飞机在天空盘旋不能降落，学生已经走进课堂——杜维明先生呢？在天空上，还没有下来。真是个 Flying man，儒学飞人。

不论如何地疲劳奔波，只要一讲起儒学、讲起学术问题，就精神焕发起来，好像不是刚刚下飞机风尘仆仆，而是刚刚在沐浴间冲洗得痛快淋漓。各种不同的听者，都觉得他讲的与自己相关，尽管他讲的大都是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尽管听者大都是美国现代青年。

哈佛的核心课程中，有属于通识教育的博士生必修课。原先杜维明教的都是西方课程，大约十几年前，他向校方提出开一门儒家伦理课。开始在普通教室讲儒家伦理，后来学生太多，改在梯形教室上课。学生又坐不下了，改到大礼堂上课。又坐不下了，改到哈佛的最大的山得斯（Sanders）剧院讲课。中国主席江泽民来哈佛演讲，就在这里。山得斯的两层圆形讲堂，满满坐着六七百学生。杜维明看到教室的地上、门外都挤坐着学生，说希望你们不要走错了地方——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一下子来这么多听讲者。孔孟学说与美国现代青年有什么关系？美国学生从小接受个人主义的教育，强调自己是独立的人。如今他们很有兴趣地来听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不那样思考问题，说人际是一个个同心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层层地往外影响他人。人不是孤立的人，是一个个互为影响的同心圆。

当然，杜维明是用英语演讲，但语言只是运输思想的交通工具。在美国，行人恪守交通规则一丝不苟，惟独哈佛，人

们急匆匆地过马路，抢时间，抢机会，哈佛不相信红绿灯。杜维明输送的中国儒家文化，吸引了这么多最有独立思想的最不受束缚的哈佛学生。偌大一个哈佛，学科云集，教授如林，只有杜维明教授在山得斯剧院上课。杜维明的课堂最大，中国文化的课堂最大。

杜维明左手插裤兜里，右手比划着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儒雅而风度。他的左肩比右肩略高，左眉比右眉略挑。他着力讲话时，脑袋偏向左侧，加上高挑的左眉和高起的左肩，他整个人就有一种执拗的牛劲，好像偏着头，牛似的全力冲向一个目标。不过他不属牛，他属龙。二月生的龙，龙首是昂扬的。杜维明昂扬的，是中国的文化。

杜维明在这么个大讲堂里上大课，也总要留出一些时间让学生提问。台上一说大家可以提问了，台下那几百人的群雕，好像经仙人一点，全都活了过来，活在自己的思想里。很多学生举起手来。我前边一金发女生，一举手，她披的外衣滑落下来，瘦削的身子穿着一件黑色背心，高高举起裸露的洁白的手臂，好像要把手伸进东方文化的神秘的云雾里。杜维明的助教拿过麦克风，走到一个个举手的学生前，让他们对着麦克风讲话。感觉里那助教拿的是接力棒，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要有很多的接力棒。

这节课结束时，全场掌声哗哗，好像中国鞭炮，在西方世界震响。忽然想到，这一堂课，是由台上台下共同完成的。因为有了杜维明，才会吸引来几百哈佛学生；也因为在新英格兰、在哈佛、在这样的哈佛学生中，才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杜维明。

杜维明在大讲堂里开的必修课，常常有些女学生去占前排的座位，超越儒家伦理地观察讲台上这位儒学权威的形貌衣着。她们会说出杜维明有怎样的两套西装，怎样的三条领带，在什么场合系哪一条领带。她们很惋惜地觉得老师太不顾及自己了。老师的裤子上有一个小洞。当然，这个洞只有这些非儒家的女学生能看到，杜维明自己是不知道的。不过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教授在京也不无心疼地讲及杜维明裤子上的这个洞。那么，我想，这已经是个著名之洞了。

杜维明的生活中，其实有不少的“洞”。他5年没在家过圣诞节了。因为圣诞的长假，是他最可以飞行演讲的时间。惟1998年圣诞他在哈佛——病了。要不，圣诞节里的他又耍一路演讲过去——台湾、香港、北京。

在哈佛，在英语世界，杜维明首创用汉语作为讨论的语言——哈佛儒学研讨会。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人类的文明，为了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可能的贡献。他提出的理念，比如“工业东亚”，总是和社会变迁、人类进步相关。中国文化和现代化碰撞激发的智慧，使他把儒学从书斋引到世界上来。80年代初，杜维明来中国大陆推动儒学。那时国内刚刚开放，有人说他是不是吃洋面包吃得不耐烦了？杜维明说，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有些事情，你不做便没有人做，做了也不见得有效果，不见得被人称道，但做和不做，就不一样。

如今儒学和西方文化的对话越来越宽广。或许，如果把杜维明乘坐的飞机航线，一道道录下来，像做心电图似的录下来，那么就可看出儒学在世界上发展的轨迹。

他的女博士生偶尔对他抱怨，说当他的学生忙得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给丈夫了。杜维明回答：我焦头烂额到什么地步了，我都不发牢骚，在哈佛当好学子，只能做和尚尼姑！

这种“和尚尼姑”的决心，是文化关怀，也是学术热情。他那传统儒学和当代思潮的沟通和挑战的理念，激活了多少黑眼睛蓝眼睛黑头发白头发。他的黑头发里也偶有银丝了。但是在任何场合，他都是最年轻的一个——我是说，他的心态。他讲话很快，他讲述他的学术观点，没有句号，接着就说：“天钢！”是让那位叫天钢的国内去的学人接着讲。天钢讲话，别人讲话，他总像一个最上进的低年级学生，勤奋地做着笔记。做笔记的时候，左手还是插在裤兜里，什么时候都有一份儒雅。他看着别人发言时，常常双手合十，儒雅中更有十分的虔诚。明明是他主讲，却惟他记得最多、最勤。或许，手记的同时就直接点击进脑电图里了？最成功的人，往往是最“笨”的人。

美国华裔的孩子，都怕念中文。因为平时用不着，总不知读了有什么用，下了课再不愿讲中文。一个中文学校老师，在课堂上问：你们中间谁是自愿念中文的？只有两个女孩举手，说：“我爱我的文化！”老师很吃惊，因为这两个女孩并不是纯华裔后代，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美国人。不过这两个女孩的父亲，叫——杜维明。

那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以中国人自居，能背庄子、背《逍遥游》。当然，她们同时又是洋生洋长的美国孩子，不能完全听懂汉语。如果家里有中国客人，杜维明讲中文，讲得客人大笑起来，女儿就抗议，说：爸爸，你讲学术讲中文，讲

笑话得讲英文，否则我不知道你们笑什么，我不成了傻瓜了？你这是忽视我的存在！

## 哈佛学生 25% 以上要选与东亚有关的学科

哈佛燕京学社，照例也是在一所新英格兰式的红砖房里。杜维明的办公室，非常欧洲的房子，非常中国的书和非常中国的人。

他那绕墙一圈的书柜顶部，放了很多的佛像。不知怎的我想起了他常说的广结善缘。惟一的沙发上，也“坐”满了书，告诉我这个屋子的主人是没有休息的 moment（时刻）的。他和各国学人对话，或是主持儒学研讨会，眼前总是放一小钟，注意着时间的掌握。他很重视 History moment，抓住历史时机，看来是从抓住每一段时间着手的。他的儒家伦理的英语演讲具有无二的魅力，虽然他着力的是中国文化在中文语境里的研讨。

他是 1962 年在台湾拿到哈佛奖学金来哈佛就读的。他研读思想史、哲学史、美学、宗教、伦理学。那时拿到哈佛奖学金的凤毛麟角，杜维明当时就有天才儿童之称。哈佛燕京学社从 1928 年成立，就着重东亚研究。但 50 年代中美断交，哈佛东亚研究少了中国大陆这一大块。可是，怎么可以对大陆这么一大块一无所知呢？1978 年，杜维明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回到大陆。

在当时，海外没有人会作这样的决定，而且觉得不现实不可行。杜维明 1978 年来到北京，又和马王堆的整理小组会

谈。1980年干脆在北京住了一年。他在北京学界，觉得几乎每天有一些可以沟通的心得。他去普陀山，一天一元钱的生活，和内宾一起打铺。他心里一直装着两个问题：一、儒学，作为严格意义的学术传统，有没有发展的可能？二、在中国，有没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就是有批判能力又有独立性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大陆一年下来，他找到了肯定的答案。

事实上1978年以后，他年年回大陆。198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一个学期，这个经验尤其使他思考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仁，仁者爱人。信、忠、义、仁、礼，是不是具有普式意义的价值？在今天是不是可以发挥积极意义？中华民族的再生，不能忽略了文化。他完全赞同市场经济的推动力，但市场经济是健康的，市场社会如果不健康，就是悲剧。如果全国最好的知识精英都被吸收到经济领域，自我反思减少，也是很大的危机。人文科学，最能凸显一个民族再生时的文化信息。大学维护自己的权威，不是靠市场，是看培养的人才。儒学可能提供、可能开发什么样的资源，来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不能光从阴暗面去消解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价值事实上还没有开发出来。越是清楚自己文明的精华，调动自己文化的资源，就越能排拒西方的糟粕。中国人文精神的涵盖性，不排斥自然，不排斥天道。

杜维明长期担任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1996年接任燕京学社社长。“我们的关怀在东亚，在中国。”他接任社长后，增加了来哈佛的大陆学人。他说“五四”以来，东亚

尤其中国知识分子，譬如胡适等，都是到西方来取经。现在，东亚有没有可能也变为美国的学习对象？各种文化都是全球意义上的地方知识。当今世界，任何一种可具有普式意义的理论，如果不通过东亚，特别是中国的检验，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理论。因此东亚研究已经成为哈佛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佛学生中，有 25% 以上希望选与东亚有关的学科。学中文的超过了学德文的。杜维明说：“希望将来中国研究的精英都在中国，我们可以配合。”

1981 年以来，定期举行的哈佛儒学研讨会，讨论语言只用英语，1991 年以后规定要有中文。我参加杜维明主持的哈佛儒学研讨会时，已都是中文语境，只是夹杂一些英语或者说“配合”一些英语。

杜维明有 20 多名助教，方能配合他的开拓精神和多元文化主张。他喜欢多元的现代性，认为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模式。说世界七大文明，都有包容性，都有交流和涵盖，都不是铁板一块。文化是流动的。各大文明互相参照，儒教文明也可以在欧美有发展前景。

杜维明说现在又是一个 Moment，历史时机，我们要为文化中国多储备一些人才，一些真正有自觉批判能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这么做，不见得有多少成果。但是如果积累，下一代人更加艰难。地球不是祖先传给我们的财富，是后代委托我们保存的财富。这种人才储备，也是一种善缘。

## 哈佛燕京的中国筷子 Show

杜维明邀所有来燕京社的访问学者和家属，都去他家包饺子。那得多少人啊？一百多人，有人说。不到一百人，有人说。客人们散坐在一楼、二楼、地下室，谁也搞不清有多少人，谁也没想跑上跑下去点人数。后来听杜维明讲，是 80 多人。他楼上楼下都数了。

杜维明右手握一酒瓶，左手还是插裤兜里，那感觉，还是在哈佛大礼堂的讲台上。一个永远的演讲者。他的周围总是围着学人，总是儒家文化的学术探讨。我想起杜维明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的：“哈佛已经成为在英语世界中经常用普通话谈论国学（中国学问）的道场。”

总算他来到地下室，那里更多的是妇人和孩子。妇人们在包饺子，孩子们在看录像——好莱坞的卡通片《花木兰》。这部卡通片全美国首映的周末三天，票房达 2300 万美元。影片为中国的花木兰注入了美国电影文化的卖点，更为迪斯尼注入了东方文化的活力。杜维明走过来盛赞这部卡通。我想，《花木兰》里忠孝两全，那是儒家文化的好莱坞式的弘扬。

杜维明家的 Party，那是中国文化的国际盛会。有各国来的中国人，有会讲或多或少中国话的外国人，也有虽然不会讲中国话但是热爱中国的美国人。一位不会讲中文的美国妇女，那么情真意切地对我说起她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孩。领养的时候，那女孩才 4 个月，现在已经 12 岁了。女孩小时候可漂亮了，现在也漂亮。她掏出显然一直带在身上的那女孩的

照片给我看。她说女儿就是不肯学中文。所以她一定要带她到中国走走，一定要让她会讲中国话。她说着双手捂胸，好动感情！杜维明说，这是个过程，到一定时候她自己就会想学中文。

波士顿好几百人领养中国女孩。有一次我在波士顿的唐人街上，前边走着一对美国夫妇，他们中间是一个四、五岁的中国女孩。她一手拉着美国妈妈，一手拉着美国爸爸。女孩短短的花格呢子裙，长长的黑袜子，嫩黄的羽绒服，长长的披肩发。这个可人的背影叫我爱得不行。她的美国父母一边走一边弯腰和她说说着话，更是把她爱得不行。我没有时间去探究为什么波士顿人领养中国女孩成风。我想，“木兰”移民美国后，会有更多的波士顿人领养小木兰。

波士顿这些小木兰的美国父母们自己组织起来，呼吁波士顿中、小学开中文课。那位对我倾诉的美国妇女，那么希望我去她家做客，她给我写下了电话、地址、名字。她并不知道更多的背景，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她太爱她的中国女儿，看见中国人就像遇到亲戚似的。

那些日子我竟是安排不出时间。我想，下次，下次，会有下一次的。我想，等我去的时候，她的中国女儿一定已经会讲中国话了。

在波士顿，在哈佛，很有一些不愿学中文的中国孩子，更有通晓中文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是杜维明“文化中国”第三世界的成员。杜维明家的 Party 上不少“老外”（当然，在这里不知道他们是“老外”还是我是老外）用筷子，都比我强。这个 80 多人的中式自助餐，几乎是个筷子 Show。杜

维明常讲广结善缘。我想，“缘”和“圆”同音，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在这个 Party 上，才有了这么圆圆满满的中国缘。

杜维明是最后一个端了盘子去拿菜的。那时长长的餐桌上已经没人了，只有一个饭粒——我是说，他的视象，放大了掉在桌上的一个饭粒。他捡起这个饭粒放进自己的餐盘里。当时 80 几个人谁也不会看到这个细节，除了我。没饭吃的人捡米粒那是当然。哈佛教授、闻名世界的儒学权威捡米粒吃，就令我震撼了。菜多得吃不完，怎么就先捡饭粒吃？这个时候，比起他在大教室演讲更像一个儒家文化的布道士。

壁炉里的火，热烈又并不张扬地燃烧着。窗外，风雪装扮着新英格兰的红砖墙，一个个金黄的灯火，好像一个个雪地里升起的壁炉。

几天后，哈佛学者报喜讯：中国政府为适应国外尤其美国家庭领养中国孤儿的热潮，最近又放宽了领养政策。哈佛大学法学院开设 China Seas Adoption Service（中洋领养服务）的机构。美国去年已有 4000 多个家庭领养了中国婴儿。联邦东区法院法官 Gleeson 三周前从中国武汉领养一女婴，取名 Nora · Gleeson 说希望孩子长大后能讲中文。说领养使他了解了中国人，了解了一个民族，使他觉得非常幸运。

## 聪明的哈佛商学院学生

### 做印度饼的神秘体验

6日走出大门，好像一步走进了一张雪景的贺年卡。地上屋上覆盖着冰凉而温暖的雪，刚下的雪，蓬松温厚，好像蓬松棉被，暖和而一无压迫感。路灯下的飞雪，在夜的背景的衬托下，黑底白雪，分外地鲜明，倒像是舞台布景。世间事物，太真实的往往被人们以为是假的。

傍晚6时我们要去哈佛广场会Z小姐。这位Z小姐，我只是在京见过一面，匆匆地，而且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一年前？两年前？没想到她也来了哈佛，在商学院就读。

她白净细挑，那对大眼睛那样地明净又那样地内蕴，那样地坦诚又那样地深沉。她着一身暗蓝装，宋庆龄似的挽起头发，好像非要把25岁的年龄打扮成52岁，小孩装大人。不过，她在25岁的年龄已经活出了很多52岁的人活不出的经历。

我并不清楚她的准确年龄。感觉中，年龄于她并不重要。她是一个很大的小孩或很小的大人。

我和梦溪一分不差地走到哈佛广场的时候，一回头，Z！就站在我们身旁，不差一分。她好像有了什么变化。对，眼睛，眼睛有疲劳感。她笑：要想精神焕发就别来哈佛当学生。她说一些身体很好的男生一个个眼睛累得像大熊猫。

我笑。我想，能到哈佛当学生的，都是人精，我应该不需要为他们担心。我们随便走进一家印度饭店。饭店最显眼处用透明玻璃围起。里边有一位印度厨师现场烘烤印度大饼，成为饭店的观赏景点。饭店暗暗的很有情调，只有玻璃围墙里的世界，通明而神奇，好像电影院里的大屏幕立体电影，又好像用神话里的飞毯把厨师从印度接到了这里。Z小姐几句话后，印度老板就明显地分外热情。她点菜的时候，老板自己来当服务生。Z小姐问老板可不可以特批我们进玻璃后边看看烤大饼？老板说可以。我从来喜欢奇遇。我蹦着跟着老板走进玻璃罩里的世界，感觉中好像走进了电影屏幕。那印度厨师把面饼贴在大手里，再用手心把饼拍进炉壁。很快就烘成一张喷香的大饼。看得我心里直痒痒。

Z小姐又问老板：可不可以让我们自己烤一张饼？

哦！我觉得Z小姐好像就植在我心里似的。怎么我刚想到什么，甚至我自己还不明确我想到什么，她就说出来了。

老板说可以。我想，现在她是老板的老板了。

我也把一张饼贴在自己手掌上，走到炉边。一看炉膛里的火好旺，手伸下去一定很烫？那也顾不上了，那也一定要把饼烤好。我尽可能地弯下腰去，尽可能地把饼拍得低一些接近炉火一些。哦，这种拍饼的快感啊！这种神秘的体验啊！

很快饼好了。怎么上边很多灰？我们连灰一起吃。Z小姐还为这张饼起个专门名词：煤灰饼。后来我想，一定是我过于卖力把饼拍得太接近炉火了。我笑：如果饭店顾客都像我们，都排队去自己做饼了，那多好玩！Z小姐笑：他们不知道是陈祖芬来这里做饼了。我们自己逗自己笑。吃了饭，吃了

冰淇淋，老板来问吃好了吗？Z小姐笑兴未完，又对老板开玩笑说我们来吃饭你也不给打折。老板说你要打折还是要送点心？梦溪说当然送点心更有趣味。

老板把饭店的十来种点心全送来了！还送来了冰淇淋，还一杯一杯地自己给我们煮了味道很足的咖啡！

我真觉得老板的诚意何时是尽头。我对着这满满一桌的甜品笑了又笑——不是吃了又吃。因为实在吃不下了。老板把顾客的戏言句句当真。我想记下这位老板的名字。我和Z小姐走到柜台前，问老板的名字。Z小姐一回头看见我的破笔，笑：你就用这么破的笔？老板听见了，立刻殷勤地送我一支漂亮的笔。我接过笔，笑弯了腰，笑得像鞠躬，全没了礼貌。人家给我笔，我应该说谢谢，说好漂亮，可我一个字说不出来，只是冲着老板大笑。真是失态！可这其实是我的常态。我的特长本不是写，而是笑。发现可乐可笑的事，心无旁顾地大笑，停不下来。这位印度老板的热诚忠厚，使我不再觉得是第一次来到这家饭店，而是有一种回到老家的安全和快活和自在。于是我笑。

老板说，下次要免费招待我吃一顿。我们说不用了。他说一定要。说着把他的名片什么的塞进一只信封说来之前给他一个电话，一定要来。

告别老板，我们三人像三个快活的神仙一样，还是大笑不止。把Z小姐送上巴士，我和梦溪还是像快活的神仙一样，把笑声一路撒在冰天雪地里。哎唷！我大叫一声跌了下来，仰面摔倒在又冷又硬的冰雪上。摔下来的瞬间，我本能地用右手撑了下地，手腕痛极了。我的手是不是断了？这真是乐极

生悲！梦溪说动一动手，看看能不能转动，如果能动就没摔断。

这也是体验，不过并不神秘。

## 迷人的像阿拉伯香吻

2月15日，大年夜。

大年夜是什么？多少年了，大年夜就是看中央一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今年在哈佛，没了中央一台也差点就没了大年夜。梦溪打他的电脑，我写我的文章。但是，Z小姐来电约我们去波士顿唐人街最大的一家中餐馆过除夕。

还有她的两位中东朋友，一位哈佛商学院的中东女生和一位中东男士。一到唐人街，就听到一阵鞭炮响。哦！我们中国的鞭炮，我心里立刻升腾起一种融融的节日感。那位中东女生以为是发生战争了——她们那儿听到枪声或许比我们听到鞭炮更平常。这位中东女生皮肤的白润，叫人看着她直发愣——怎么会有这样好的肌肤？眼睛的明澈清纯，叫人觉得她纯美得没有一点杂质。

我们在中餐馆坐下。Z小姐用茶壶给各人倒茶，我用食指和中指轻叩桌面表示感谢。这种感谢方式在国内早已雅俗共用。阿拉伯美人问这是什么意思？Z小姐对她说这是表示感谢，她灿烂地笑起来。我们几个都像看一幅名画那样看着她：美极了！她嫣然一笑，用食指和中指轻轻叩桌面表达谢意。我们大笑：只有倒茶才这样表示感谢！

那位中东先生突然用中文大声说：女士们先生们我饿了！

本来，我们一边看菜单一边寒暄，好像看戏时的序幕。但是他饿了。很可能在座的都饿了。但是他说出来了，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了。如果是一个三岁顽童，那没什么。但他是一个成人，一个客人。我们先是一愣，继而大笑起来。最本色地出现的往往反而被人觉得可笑。世界常常就是这样地不公。

他很能说一些中文，显然地很爱中国。说中国诗与阿拉伯诗的韵律很像。说自己会下围棋，可惜下不过陈祖德。我们又大笑。说真话也可笑？他说他还会中医号脉。我们又笑——中东先生怎么会号脉？我立即伸过手腕去，看他会说出些什么来？他像模像样地号我的脉，我想如果让他演个号脉的小品，准保就是这个表情。这位中东中医开始宣布诊断结果，说我心肺很好有点肾亏，近日来吃过消炎药。讲得全对！我前天是过量地吃了消炎药。其实只是着了凉，可是当晚要参加 party，我怕万一发烧去不了，就大剂量地吞药，本来是不必吃药的。“本来可以不吃消炎药的。”他说。天！他讲得太对了！

于是一条条手臂都向他伸去，中医号脉大显神威。阿拉伯美人说她爱中国，她一定要去中国。说着她又要梦溪看手相。梦溪开始半人半仙地看起手相。中东先生决不示弱，说 he 可以用号脉来看相，说着就为 Z 小姐号脉。两先生在餐桌上决一雌雄。三女生乐得免费看相，免费号脉。中东美人知情知义，按照阿拉伯礼节，给了梦溪几个香吻。

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第一次感觉到了阿拉伯文化的迷人。当然，这个大年夜，吃的是中餐，传播的是中医和手相，餐桌上方贴着红色条幅：招财进宝。整个儿是中国

文化秀。可是如果没有这两位中东朋友，没有阿拉伯文化的相谐相衬，中国文化不会得到这样别有情致的展示。我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笑声，梦溪也不会有这么甜美的香吻。

这一切，都是 Z 小姐的巧安排。本来我们说好还去那家印度餐馆的——老板那么盛情相邀，不去不好。但是，任何的重复都不会带来新鲜感。Z 小姐可以再去印度餐馆，但不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她“背信弃义”地订下中餐馆，又增加两张中东面孔，我知道，她做什么事都能做好。明天她要在哈佛商学院和肯尼迪学院上 4 节课，来回赶路。我心疼地望着她疲惫的眼睛，这位聪明的哈佛商学院学生怎么顶得下来？我只好安慰自己：她什么事都能做好。